

阳明心学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现代价值

王永昌 王磊

专家观点

阳明心学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其典故。浙江在传承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要重视和把握好这一独特资源。其中,阳明心学对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现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文以育人,文以成人,文以兴业。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活动及其物化成果中的精神标识。人类任何活动都以相应的思想文化作为内在的基因并发挥引导作用,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活动,也都离不开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土壤。这是传统文化影响今天和将来人们生活的内在机理和历史逻辑。国家通过文化建设去引导人、影响人、塑造人、成就人,从而逐步达到以文铸魂、以文育德、以文传道、以文图强的发展目标。

2005年6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指出:“浙商源起于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源起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源起于浙江资源环境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也代表了浙江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创新精神和开放精神。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由于历届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放手发展。浙商自草根中来,每一位浙商的成长都伴随着克难攻坚的拼搏,每一位浙商都有一部艰苦的创业史。”习近平同志肯定了浙商的形成有着“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也充分肯定了“四千精神”对浙商成长的巨大作用。可以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交往的背后,都有着思想文化的内导因素和能动作用。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许多积极的思想观点与价值观念,比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理

念,越来越渗透到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之中,对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发挥着独特的涵养作用。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派,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和学术缺憾,但它对5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已经将并将进一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阳明心学弘扬的主体性精神对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内在的激励价值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就是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实践。所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家品格的塑造、企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昌盛,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主体性和基础性意义。

可以说,阳明心学所揭示的许多学理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素养培育和品格塑造,都能发挥教化和陶冶作用。而长期以来,阳明心学在国内和东亚文化圈的企业界广受关注,甚至企业界还陆续兴起过学习阳明心学的热潮。这与新时代大力倡导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关,也与阳明心学本身的思想特质相关,尤其是阳明心学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强调发挥人的主体力量、人心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正是企业家们兴办企业、开拓事业、发展产业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种拼搏创新的精神特质,与企业家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更成了企业家们吸吮文化营养、赋能增力的丰沃沃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风浪中,在当今时代经济、政治、科技形势瞬息万变的发展环境中,企业家不单单依靠资金和技术的实力去竞争拓业,更重要的还要依靠自身的思维、自身的素质、自身的品格、自身的精神,也就是用自身强大的心力去拼搏奋斗、艰难创业。企业家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胜利,离不开战胜自我、提升自我和强大自我。高明且有作为的企业家,通常会用自我内心的强大这个能自控的确定性,去应对外部世界和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这就是说,企业家在创业奋斗中,需要具备主体性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心力,才能成就事业。

企业家通过接触和学习阳明心学的一些核心思想,比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能够切身体悟到其中所蕴含的主体性精神和实践精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以增强自信、减轻心理压力、持续汲取正能量,从而不断提升认知世界、驾驭市场、管理企业的能力。显然,阳明心学所高扬的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的重要性,正是感召企业家、激励企业家、培育企业家的一帖“强心妙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浙江大地上形成了一个蜚声中外的浙商群体。目前,浙商队伍达到了近千万人的规模,其中有数百万人在省外和海外拼搏创业。浙商的规模之大、浙商所具有的艰苦创新创业精神和经商智慧,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能在浙江的土地上形成浙商群体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同浙江独特的历史文化相联系的。以文化人,文以载道。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等学派的学术争鸣,以及整个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都对浙商群体的兴起产生内在的催化作用。阳明心学作为浙东学派乃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派,自然也对浙商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阳明圣学、心学、实学对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独特的内导价值

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人们通常称之为心学。这是就阳明思想的主要内涵和特性而言的,或者说对“心学”作了比较广义的理解。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阳明是以心学集大成者占据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就此而论,将王阳明的学说概括为“心学”是恰当的,也是学界的普遍共识。

当然,如果进一步具体地讲,对阳明先生的思想和学说,分别提炼概括为圣学、心学、实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就其学说中的主要构成内容和特点说的。就此而论,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唯有圣学、心学、实学及其“三学”合一,才能更整体地构成阳明学或阳明思想。

王阳明的圣学思想,作为人们追求圣贤之学,显然与企业家追求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事业更大价值、追求卓越人生等功德事业圆满的境界相合相通。企业家塑造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法治

观、事业观、财富观、企业观,去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榜样,就是以自己追求“圣贤”之心,去提升自己、去培育企业、去鼓舞他人,进而助力社会的文明进步。要达到以上这些目的,都可以从王阳明的圣贤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圣学中源源不绝地得到丰富养料。

企业家根植在市场之中,一切理想和抱负,都必须知行合一,付之于实践,切实地行动,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奇迹,达到心物、人我的一体。企业家时时处在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唯有勇于进取、奋力搏击、身体力行,才能成就事业。这就是一种务实创新精神,一种企业家的实践哲学。而这恰好与王阳明思想中的实学特性相吻合。企业家在台上看似风光,但在台下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所经历的奋斗和挣扎,则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实际上,事业做得越大,各方面的压力往往也越大,包括同行业竞争压力、资金压力、心理压力、舆论压力、家庭压力等。所以,企业家要靠自己的拼搏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专业精神、进取精神、追求卓越的精神,以及顽强奋斗的实践意志和强大的心力,去战胜困难、成就长远的事业。企业家本质上就应该是实干家、行动家、实践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学思想,是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特质的生动写照,对企业家具有独特的内在的引领作用。

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把追求自我事业的成功和奉献社会相结合,尽力做到义利并举、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自觉涵养强烈的家国情怀,树立社会责任。当财富达到一定数量后,高素养的企业家常常会领悟到自己创造的财富本质上也是社会的财富,进而把个人的财富和社会进步贯通起来。极言之,个人用广阔的光明之心去透视世界,打通心与外界之门,更能体会到实现个人追求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性。这些理念,人们也都可以从王阳明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智慧的启迪。

总之,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的确离不开企业家主体性精神的培育和心力的塑造。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的发展力是企业家心力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家心力的竞争,企业的创新力是企业家心力的创新。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以浙江产业提升优化长三角产业层次

卓勇良

长三角论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在谋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浙江不仅积极促进自身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融入和助力长三角产业格局的积极变化。

一、浙江产业现代化转型的主要特征

摆脱“纺织业纠缠”是浙江产业演进的重大进展。2007年,纺织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1.6%,到2020年,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纺织业所占比重已降至5.6%。纺织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入口。然而传统纺织业增加值率低,严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且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只是漫长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平台,实施转型势在必行。上世纪30年代左右,丰田汽车的母公司出让纺织专利,转而进军汽车业。因此,纺织业跌落霸主地位,是产业演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服务业加快发展是浙江现代产业增长的重要内容。2015年,浙江第三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为48.6%,高出第二产业1.2个百分点。2020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5.8%,超过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这里包括三种类型的服务业: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服务业,其中包括满足基本生产活动需要的若干服务业;促进人的发展的服务业,包括教科文卫等;提升要素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高水平商务服务业等。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创业创

新再也不是小而全或大而全,而是专注于若干高度细分的领域,一系列现代服务业无中生有发展起来;若干服务业也从原本的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如会计、供销、设计、战略咨询、投融资,乃至餐饮、保安等;一系列新创企业瞄准市场需求,积极提供精准的高端服务,开发了全新的服务领域。正因此如此,浙江区域经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服务业增长快于制造业增长的发展态势。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企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经营,有利于高新产业发展,有利于全面优化提升要素效率,同时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途径。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独特优势。按省统计局初步测算,2021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348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同时,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成为浙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此外,2003年至2015年及稍后一段时期,浙江还出现了一波“比较谦虚”的“重型化”的发展。其标志性特征是金属冶炼与金属制品业,以及石油、化学与医药业,占全省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

二、浙江产业转型对长三角产业层次提升的重要意义

浙江跳出传统产业窠臼,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本土产业层次,同时通过区域分工协作和良性竞争,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促进沪苏浙皖新的产业布局逐渐形成。

长三角整体产业层次因浙江的产业提升而得益。诸如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升级或转型升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腾挪出更多资源、更大空间。与此同时,浙江的金属及石化行业正保持相对较高的占比,符合浙江实际。如浙江的不锈钢、铜、钴等冶炼及深度加工,以及立足于浙江深水岸线优势的石化行业发展等,都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及江苏的产业结构形成较强互补。浙江的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以及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与沪苏的数字硬件优势相匹配,进一步增强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

长三角产业格局十分有利于增强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上海作为大都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高科技引擎作用,苏浙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如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浙江数字经济领先、民营经济发达,安徽制造特色鲜明、创新活跃强劲等,三省一市更加坚定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形成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制高点。同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浙江也以外贸强省的定位,助力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发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枢纽的积极作用。

三、加快浙江产业结构演进的三大抓手

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换言之,产业结构多半并非主观意志能够直接左右。因此,虽然社会各方对于产业结构有很多美

好愿望,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久久为功的过程。当然必须强调,只要各项工作做得好,产业演进之花怒放是必然的。

进一步确立积极的“工在诗外”的产业演进推进策略及工作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观美好愿望是要有的,而且要强烈而坚实;但需要摆正主观美好愿望的位置,而且要避免越位和变形。“工在诗外”的意思就是,优化政府产业选择的意志与工作,着力强化政府的环境创造与改善职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构发展环境、做好服务、支持及促进民间积极力量上。

建构多层次有弹性的产业引导发展激励促进体系。首先是“格式化”,读懂读深读透这方土地的内在呼唤及全球产业趋势,深入研究发展战略,明确框架式、有弹性的产业规划,实施引导式的产业政策。其次是“平台化”,积极建设各种实体及虚拟平台,助推创新创业及企业发展。第三是“责任化”,战略及规划要求均要落实到部门和个人,这也是“格式化”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市场化”,具体操作的相当部分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第三方机构实施,包括战略研究、招商引资、园区服务等。

“舵手”与“桨手”兼具。政府是掌舵的,首要任务及主要精力当然就是当好“舵手”。但与此同时,政府主管也要一定程度地当好“桨手”,且县镇主管的“桨手”任务会偏重一些。对于重大产业项目,即使发达经济体,多半也需要地方主管出手才能搞定,这就是高段位“桨手”在产业演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大产业项目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稳坐钓鱼台”,而要主动出击,亲力亲为、创造条件、争取落户,并且督导项目顺利施工及落成。

【作者为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之江青年论坛

一年来,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瞄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传统治理的难点堵点,打造出一批管用实用的标志性成果,从整体上推动了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此基础上,须进一步优化改革理念、组织架构、应用成果和治理过程,实现数字治理向智慧治理的整体跃升,努力形成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

推动改革理念从微观视角向宏观视角跃升

要立足全省发展大局,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宏观场景中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着力点,突破部门、层级和区域的限制,系统谋划让子系统、子场景、子要素关联起来的集成改革,全面提升数字化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实现数字化改革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一致、跑道对接、激励相容、政策协同。对标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的要求,当前数字化改革的重点应当包括:探索数字技术时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构建群体全面覆盖、个体精准画像、靶向帮扶激励的数字化集成应用,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先行示范;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需求,探索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和价值实现,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以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抓手,探索数字变革撬动区域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探索品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路径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智慧网络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行示范;在完善碳排放和GEP核算应用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数字变革与绿色低碳变革的协同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探索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工作的有效路径,推动社会治理先行示范。

推动组织架构从线性结构向有机生命体跃升

数字化改革是一个从业务模块的物理集聚逐步走向技术与制度深度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赋予数字化治理系统感知、认知和思维能力的过程。过去一年,浙江构建起了横向多跨协同、纵向贯通基层的数字化改革体系架构,在此基础上,要加快推进数字化组织架构演化,形成一个具备自我学习、自我调整和自我进化等特征的复杂巨系统。首先,要通过数据全量归集、系统多维集成、算力算法优化,不断提高中枢系统的运转效率。特别要在进一步完善多跨协同的过程中,着力提高对全量异构数据的融合分析,充分激活系统沉淀的历史数据,深度挖掘数据之间的潜在连接和内在价值,实现“大脑”对全域治理体系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和协同指挥。其次,要针对不同领域核心业务运行机制的差异,建构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互洽的智慧系统。重点是协同推进业务系统迭代和干部数字化变革能力建设,发挥各级干部治理智慧与系统算法算力叠加的优势,提高各领域的智慧治理水平。最后,要推进向基层延伸的神经网络建设。重点是面向基层治理实践,有选择地将功能模块嵌入集成到现有的基层治理平台,让基层村社快速成长为敏锐感知风险变化的前沿、精准送达公共服务的终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和在各种紧急突发情境中能够快速响应的作战单元。

推动应用成果从地方特色向引领示范跃升

打造具有高获得感、高辨识度、高适用性的数字化应用成果是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核心环节。要对已有应用进行系统整合和迭代升级,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符合数字时代规律的标志性成果。一是要聚焦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个性需求,打造能够在全省域贯通生效的应用。在统筹推进数字化改革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充分吸纳地方创新经验,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增设能够满足用户和基层个性需求的功能模块,形成“广泛采集—智能分析—精准回应”的闭环,提升企业群众使用各类应用的便捷感、普惠感、安全感以及对政府部门高效运行的信任感。二是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打造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在试点先行的基础上层层放大数字化应用的规模效应,总结提炼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改革逻辑,以“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的形式整体输出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数字化改革经验。三是要聚焦治理现代化的风险挑战,打造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应用。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整合集成应急处突、疫情防控、经济监测等风险治理平台的建设经验和数据资源,准确研判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范围,依据周期性风险优化治理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打造能够提升治理体系活力与韧性的标志性应用成果。

推动治理过程从职能驱动向数据驱动跃升

数字治理向智慧治理演进的标志之一是数据从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逐渐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变量。浙江省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建设为数字化改革构筑了坚实的基座。要在数据资源有效归集的基础上进一步管好数据、用好数据,让数据运转起来,实现从职能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治理变革。一方面,要打通数据价值转化的制度性通道。全面梳理并逐步破除数据壁垒、归集、整合、共享、开放、应用等全生命周期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数据合法合规地有序流动和创造价值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实现数据流与业务流的协同优化。将数据采集利用水平作为治理现代化的绩效指标,引导治理主体自觉以数据流优化业务流。重点是在决策环节,提高依据数据分析进行风险感知、趋势研判、战略部署的能力;在执行环节,提高依靠数据运转推动政策精准落地生效的能力;在监督环节,提高依据数据碰撞甄别权力运行失范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新书推荐

近日,《新时代党的建设十二讲》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由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党史学会副会长郭亚丁教授所著。全书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等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全书在理论阐述的浓厚基础上,充分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浓厚的时代色彩、丰富的时代内涵;在具体内容上,既包括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也包括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设成果。本书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践总结,方便党务工作者学习及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用。

